

禅诗与苏非文学

郝龙余

[内容提要] 中国文化将印度禅法改造成中国禅宗,反过来它又极大地影响中国文化。禅诗是这种影响的重要体现。苏非是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思想派别,苏非文学是其重要产物。禅宗、禅诗与苏非、苏非文学有极大的相似性,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通过介绍与比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和认识禅宗、禅诗和苏非、苏非文学,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提出一个新的课题。

禅诗,是当今中国的热门话题,但存在诸多误读与曲解。苏非文学,对不少人来说,大概还比较陌生。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了解这两者。

一、禅宗与禅诗

禅宗,是最典型的中国佛教,是中国文化改造印度佛教的产物。禅在印度古已有之。从达摩东渡到五祖弘忍,禅宗在中土不断发展壮大。然而,使禅宗发生根本变化是六祖慧能。慧能是文盲,少数民族,地处边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获得衣钵,标志着禅宗向更广大的民众开放。慧能对禅宗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改革,被称为“六祖革命”。这场革命由他的子弟不断引向深入,终于使禅宗从“见性成佛”发展到“呵佛骂祖”,从“即心即佛”发展到“即人即佛”,从“佛性清净”发展到“无依道人”,从“道不在坐”发展到“随缘任运”,从“不假文字”发展到“应机接化”。这场革命,使印度佛教完全改造成了中国佛教,禅宗本身获得极大发展,在各宗派中具有压倒优势,几乎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

禅宗最显著的特点是世俗性、简易性和神秘性,其实质是追求自我,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世俗性,迎合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和王道政治,是佛教在中国求取生存的必然结果;简易性,迎合了中国各阶层广大民众求快求易的心理,目的是获得自身的发展;神秘性与世俗性、简易性相辅相成。正是这种神秘性,使禅宗经久不衰、充满魅力。追求自我,作为禅宗的自的,又是其发展的原动力。小乘佛教,通过三十七道品的修持,使一部分人获阿罗汉果;大乘佛教能普渡众生,经过六度的修持,便是菩萨行;禅宗,从渐悟、顿悟到立地成佛、人人皆佛,彻底抛弃了宗教的负罪感和恐惧感。这种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反过来又对中国哲学、政治、思想、文学、艺术、民俗等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禅诗,是在禅宗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特殊文学类别。严格来讲,应称为“禅文学”,除了诗之外,还有充满禅味的散文、小说、戏剧等等,但禅文学之名并不通行。禅诗“禅文学”中最大宗、最具活力、最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所以“禅诗”实际上成了“禅文学”的代名词。

从作者构成上说,禅诗包括两大部分,禅僧的禅诗和文人的禅诗。禅诗是中国诗苑的重

要一部分,数量相当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万首左右。从内容上分,禅诗又可分为禅理诗和禅意诗两类。禅理诗,又可分为示法诗、开悟诗、赞颂诗等,这类诗富于禅家的哲理和智慧。禅意诗,包括山居诗、佛寺诗、游方诗等,此类诗充满禅家超尘脱俗、淡泊宁静的情趣。

禅属宗教,诗属文学,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两者有相通之处,都追求言外之意,都注重启示和象喻,都需要深切而敏锐的感悟。禅通过内省体验,产生妙语;诗则将妙悟形诸文字。禅与诗结合,使禅从不立文字到文字禅,禅师们寻章觅句,常在文字上下功夫。诗与禅结合,使诗别开生面,充满理趣,言有尽而意无穷。两者相得益彰,互为相长,真所谓“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1]但不能一概而论,不是所有的禅诗都好。今天,我们从审美角度来看,有些禅理诗缺乏美感。所谓禅理诗,就是将禅理引入诗中,弄得不好往往只有诗的外壳,禅的筋骨,而缺乏血脉灵魂。只有两者结合得好的禅理诗,才具有诗趣,如苏轼的《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真正好的禅诗,是那些句不言禅,诗外有禅的禅意诗。如王维《辛夷坞》,令人回味无穷:

木末芙蓉花,山日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诗中无一字言禅,但禅言溢于辞表,读后令人“身世两忘,万念俱寂”。

布袋和尚也有一首通俗浅近而禅理深蕴的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禅诗的出现与兴盛,是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为禅宗的发展推波助澜,锦上添花;不仅改变了一代诗风,而且影响到人们的审美意识。

历史上著名禅家诗僧不少,如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贯休、德清、敬安等等。他们写下了大量禅诗。其中一些名作广为传颂,如神秀的示法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以及慧能的示法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但相比较而言,文人的禅诗影响更大。历史上,不少著名文人崇信禅佛,如谢灵运、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东坡等。有些文人虽不信佛,但亦受禅诗影响。崇道的李白也写下《庐山东林寺夜怀》一诗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之句,充满禅味,尊儒的杜甫也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2]之咏。禅诗对审美意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禅家的妙谛来论述作诗的道理,先后涌现出了不少以禅论诗的诗学著作,如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等,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二、苏非与苏非文学

苏非(Sufia)原指穿粗羊毛外衣的人,后来称呼苏非派信徒。苏非派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思想派别,约出现于公元9世纪。但苏非思想和行为,在公元前7—8世纪即已存在。苏非派的出现决非偶然,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古兰经》多处提到,人类和世界将要毁灭,穆斯林须苦修,不可沉缅于物质享受。其二,奥斯曼哈里发被杀后,伊斯兰社会动荡不安,伍麦叶王朝的当权者沉溺于酒色,引起穆斯林们的愤慨。其三,由于伊斯兰的扩张,交往增多,受到东方宗教、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等的苦行主义、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

苏非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约于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苏非派开始孕育。其内容为通过禁欲、苦行,达到个人与真主的直接沟通。这种经验的取得不需理性思辨,只需神秘的内在直觉。所以,苏非主义实质上是对伊斯兰教的理性主义及形式主义的宗教礼仪的否定。女圣徒拉比亚·阿达维亚(717—801)创立神秘的爱的教义,并终身不嫁,将终身奉献给安拉。他认为安拉是永恒的美,追求美的道路是忘我的无限之爱。她的神秘主义的爱构成苏非神秘主义的基础。以上是苏非主义第一阶段。

公元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下半叶,是苏非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9世纪初,苏非神秘主义中出现了“神智”这一关键词。后来由埃及人祖奴(?—860)奠定了神智论,并成为苏非派神秘主义的支柱。神智论认为只有“出神”才能真正认识安拉。知识是感官感觉的结果,确信是通过直觉视见的结果。哲学家、辩证家、神学家无法用推理或证明求得有关安拉的知识,只有信徒才能获得。祖奴的神秘主义,被正统派视为异端。

神智论逐渐发展为泛神主义,标志着苏非主义发展到了第三阶段。波斯人巴亚齐德·比斯塔米(?—875)创造“灭寂”论,通过出神将自身完全消融于安拉之中。另一位波斯人哈拉智于908—909年间广为布道,阐述了泛神主义见解。他的“我是真理”(意即“我是真主”)的观点,触怒了一般教徒和当权者。他受到一系列最残酷的刑罚,最后被杀头焚尸。苏非派面临危机,有被取缔的危险。在此形势下,苏非派内部发生分化,其中大多数采取稳健作风,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苏非派走上了与正统信仰结合的道路。作为向正统派靠拢,苏非派在理论上将“陶醉”、“清醒”区分为不同范畴,并主张在陶醉(出神)情况下口出狂言“我是真理”是不作数的,只有在清醒状况下说的话才真正反映苏非思想。公元10世纪末,出现了一批苏非学者,从理论上阐明苏非的正统性。11世纪,波斯著名苏非侯吉维里(?—1071)将苏非分成12支,10支为正统,2支为异端。将苏非思想与正统信仰结合的最后完成者是安萨里(1058—1111)。他享有“宗教复兴者”、“伊斯兰教权威”的盛誉,在经过长期亲身体验之后写成《圣学复苏》一书,主张伊斯兰教应重建于个人信仰经验的基础之上。为了给正统信仰增强活力,使教徒对安拉的信仰真诚而持久,安萨里将苏非神秘主义引入以艾以什里派神学为基础的官方教义,使苏非主义真正合法化,而且在伊斯兰教中居统治地位达5、6个世纪之久。在伊斯兰教史上,出现了一个辉煌的苏非时代。苏非派走完了从在野派到正统派的全部路程,出现种种流弊。到18世纪,终于在瓦哈布“一切回到古兰经”的复古旗帜下,苏非主义受到抑制,伊斯兰教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苏非派具有以下五个主要特征:一、虔诚苦修。苏非派摒弃物质欲望,追求道德升华,视功课、爱主为最高精神享受。二、寂灭自我。通过苦修追求自我绝对真理(真主)合一,即寂灭自我,然后恢复自我,更加坚信真主的存在与全能。三、揭示认识。这是有别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第三种认识真理的方法。即在寂灭自我过程中,真主通过瞬间揭示,给他一种确信不疑的认识。四、心宁气静。通过苦修,克服、抑制各种欲望,摆脱忧愁、恐惧,达到心宁气静。五、语言隐晦。苏非派在苦修中的各种感觉是特殊的,非常人所能理解,非常言所能表达,所以通常使一些双重念义、隐晦难懂的语言,常人需通过分析思考才能解析其真意。

苏非的真谛是什么?一位有名的长老说:“头脑里装的,要摆脱;手头上有的,要施舍;力所能及的,要竭力做。”即是去非分之想、施舍钱财和行善济人。还有长老认为苏非是由“洁身自好”、“乐善好施”、“勿扰他人”三泉汇成大海。^[3]两人的解释大体相同,基本上揭示了苏非

的实质。

苏非主义对文学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苏非文学是指苏非信徒或受苏非思想深刻影响的诗人创作的富于苏非思想的作品。从类别上说既有诗歌,也有散文、故事、寓言、传说等样式,但以诗歌为大宗,包括短小精悍的哲理诗,长篇巨制的叙事诗等等。从数量上讲,是极其丰富的。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前后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苏非诗人。正象苏非主义为伊斯兰教增光添彩一样,苏非文学使伊斯兰文学大为增色。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苏非诗人执伊斯兰文坛牛耳,苏非诗歌为伊斯兰文学主流。许多苏非诗人,不仅享誉伊斯兰世界,而且为世界文学史谱写了重要的一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苏非主义哲学思想的表述与传播是通过苏非文学来完成的。

苏非诗人中许多人名声卓著。其中尼扎米、萨迪、鲁米、哈菲兹都是世界级大师。他们的作品《五卷诗》、《果园》、《蔷薇园》、《玛斯纳维》等都是世界文学名著。

尼查米(1140—1202)自幼信奉正统的逊尼派教义,作品中多训诫格调。后来改宗苏非,诗风大变,文笔趋于简朴。他的《五卷诗》塑造了一系列离经叛道的主人公,对统治者和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无情鞭挞,对善良、正义、理想热情讴歌。思想深刻,入木三分;笔法生动,刻划人物呼之欲出。他是卓越的叙事诗大师,继菲尔多西之后的第二个伟大的波斯古典诗人。

萨迪(1208—1292)被誉为哲理诗的翘首,是位名扬天下的百岁诗人,《果园》、《蔷薇园》是他的代表作。他语言准确、简洁、笔调轻松、幽默。不少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有两大特色:一是带着苏非派诗人常有的冥想、神秘和乐天色彩,一是丰富纷繁的、五光十色的人生经验。^[4]

哈菲兹(1320—1391)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深受苏非思想影响。诗中不但有不少苏非术语,而且用象征、讽喻等手法、批判假仁假义的伪君子,然而,他又不同于一般的苏非教徒,不甘于顺从命运,他放荡不羁,通过对美酒、美女和爱情的描写,抒发自己的意气和众生的愿望。

鲁米(1207—1273)是神秘诗的集大成者。他的抒情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被人称为苏非诗歌的顶峰。六卷诗集《玛斯纳维》是他的代表作,以寓言、比喻、传说、故事等形式,表述苏非思想,受到广泛欢迎,被誉为“波斯文的《古兰经》”或“苏非派《百科全书》”。^[5]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精神导师,在苏非派穆斯林中享有显赫名声。

以上仅是苏非诗人中的荦荦大者,但已经能说明苏非文学广阔而深邃的内涵。

三、禅诗与苏非文学之同

要弄清禅诗与苏非文学的相同之处,首先应明了禅宗与苏非主义的相同之处。

(一)对宗教现实不满的产物

禅宗和苏非的产生,都是宗教徒对当时的宗教现实不满的结果。其实,“禅宗现象”或“苏非现象”是各种宗教发展史上普遍存在的共同现象。一个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暴露出各种弊端,这就会引起一部分宗教徒(常常是中下层)的不满。为了表达、排除这种不满,就会产生有异于正统的、当权者的思想和言论。只要一成气候,这种思想和言论就会形成一种思潮。禅宗就是当时对佛教现实(繁琐哲学、繁文缛节)不满的产物,南宗(农禅)是对北宗(官禅)现实不满的产物。同样,苏非派是当时伊斯兰教(当权者沉缅酒色、一部分信徒行乐享受)现实不满的产物。

（二）在社会动荡中发展

禅宗和苏非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的动荡不安关联密切。

隋末唐初，战乱不已，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逃亡，给禅宗的发展造成大好机会。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南宗迅速壮大，终于压倒北宗，成了佛教主流。两宋中央专制增强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禅宗籍此机会获得新的发展。

公元656年，奥斯曼哈里发被刺，爆发伊斯兰历史上第一次内战，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许多穆斯林不愿卷入政治斗争，虔诚拜主，专心苦修，便出现了早期的苏非。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西亚、中亚许多国家相继沦陷，民族经济、文化遭到摧残。亡国之民被迫改宗伊斯兰教，很容易与伊斯兰教中的反对派苏非思想一拍即合。后来蒙古人入侵，许多地区被征服，伊斯兰教失去官方信仰地位，而各种苏非教团坚持传道，不但使伊斯兰教没有中断，而且发展到许多新的地区。

（三）有一个相似的发展过程

禅宗和苏非开始时，都有一段隐伏期。形成一定势力后，都渡过漫长的非法期，经过不懈斗争，终于取得合法地位，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处于统治地位。如禅宗从唐到清，是中国佛教各宗的主导。苏非主义从11世纪到17世纪，一直是伊斯兰教的思想主流。

禅宗和苏非都经过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衰落—回光返照的过程。初时他们都奉行苦行，具有批判精神，富于生命力，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并在理论、组织等方面走向成熟，最后又都放纵自己，无可奈何地衰落。到现代，由于各种刺激，禅宗和苏非主义又都出现了回光返照。“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禅在英、德、法、美等国得到特别的发展。”^[6]中国近十多年来，也掀起了“禅宗热”。苏非主义进入近代虽然失去了统治地位，“可是，苏非主义对伊斯兰教内在的影响再也难以剔除了。”^[7]跟禅宗一样，许多国家也出了“回光返照式”的“苏非热”。正是这种“回光返照”，增强了研究禅诗与苏非文学的实际意义。

（四）具有神秘主义色彩

禅理玄妙，非言语可表述，只有依靠感悟。这种感悟的获得，一靠他人的帮助，二靠自己行禅。他人帮助只能是启发、点拨，而不可道破。行禅造成心理畸变，产生种种幻觉，信之者谓神通，不信者称禅病。对这种神通，禅宗主流采取信而不宣或不置可否的态度。“感悟”和“神通”都是思维的非常态。而语言是常态思维的表达工具，所以感悟和神通就必然难于用语言表达。这就是禅师们用喝斥、棒打来示意的原因。这实际上更加重了神秘的色彩。

苏非主义的神秘性具有自身的特点。苏非派认为，一切都是可以认知的。但不同的知识，只能用不同的方法去认知。世界上的知识可以分为三类：理性的知识，情况的知识，秘密的知识。理性的知识，可以通过审视和论证获得；情况的知识，由理性通过感官获得，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知晓；秘密的知识，在理性之上，非理性所能认识，只有靠真主的恩赐才可以认识。认识真主是最高的知识，只有体验、品味、倾向最高知识的客体，精神与之相倾，才能获得这种认识。

印度的“静坐视心”（与禅宗“坐禅观心”通）对苏非派有直接影响。比斯塔米非常重视静坐视心的实践，首先详细描述“与神合一”的神秘体验，并把这种体验过程比作“登霄”。^[8]

除了上述四条之外，禅宗与苏非主义还有一些相同之处。如两者为了取得合法地位，都自认正统，将自己的历史与教主直接挂钩。禅宗追溯到“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苏非派则将自己和穆罕默德与《古兰经》联系在一起。两者的传播情况也有类似之处，禅始于印度，在中国

大行其道,日本、朝鲜、越南及近代西方,都有影响。苏非起于阿拉伯,大盛于波斯,南亚诸国及近代欧美,都有波及。还有,两者都从张扬个性、解放自我出发,禅宗说“我就是佛”,苏非派说“我即真主”,最后都走向了反面。

宗教文学即是宗教载体,又是宗教的存在形式,所以几乎每一个伟大宗教的经典,既是教义的经典,同时又是文学的经典,象《圣经》、《古兰经》、《吠陀》等等,莫不如此。所以,以上我们所分析的禅宗与苏非主义之同,基本上也就是禅诗与苏非文学之同。

四、禅诗与苏非文学之异

禅诗与苏非文学之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相辅相成与独领风骚

禅诗的相辅相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禅诗与其它文学之间的关系,是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尽管禅诗影响深远,但它毕竟象月夜潮涨一样,并无赫然声势。禅诗虽然数量不少,但没有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而只是中国文学中和谐而别具风格的一部分。中国出了众多禅诗人,其中包括诗僧和写禅诗的文人。写禅诗的文人,有崇佛参禅者,也有尊儒崇道者。尽管禅诗人社会地位不同,宗教信仰各异,但总体而言,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二是禅与诗的结合上,互相渗透,互为相长,所以有“以禅喻诗”之说。古人写了不少以“学诗浑似学参禅”为警句的诗。如《吴思道学诗》:“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禅与诗所以如此投合,是因为两者都需要“妙悟”。妙悟是禅与诗结缘纽带。以上情况,和禅(佛)与儒、道成鼎立之势,又能长期基本上和睦相处的总体社会格局相一致。

苏非文学的独领风骚是苏非主义在伊斯兰世界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结果。苏非派经过一个发展阶段,终于在安萨里时与正统信仰相结合,接着便成为伊斯兰教的主流,前后长达五、六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苏非诗歌创作经久不衰,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仅苏非派诗人,就是一般诗人也受到他们的影响,诗行中也往往带有苏非思想色彩。有一种观点认为,波斯诗人中在菲尔多西以后,无不受到苏非思想的影响。^[9]苏非文学得到充分发展,成了文学主流。在此期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诗人,是苏非诗人,或是有苏非思想的诗人,象阿塔耳、鲁米、萨迪、萨迪伊、尼扎米、贾米、哈菲兹、加耶西等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大诗人,文坛泰斗。自然,在这段时间里,第一流的作品也大都属于苏非文学。

总之,从作者阵容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来看,禅诗与苏非文学有较大区别。

(二)小巧精妙与美轮美奂

由于汉语的特点及中国人崇尚简洁,中国诗文大都短小,《孔雀东南飞》号称汉语长诗之最,也只有1700多字。禅家不以文字为诗,不才学为诗,也不以议论为诗,而靠妙悟。妙悟难得,悟后成诗更难得。所以,由于中国诗歌传统与禅诗创作的特点,决定了禅诗的小巧与精妙,不可能产生巨制宏篇,从现存的禅诗来看,绝大多数是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和七言律诗。

苏非文学则不同。从体裁上讲,除了诗歌,还有散文、故事、寓言等,但以诗歌为主体。象印度一样,伊斯兰世界也很流行散文与诗歌相同的体裁。萨迪的《蔷薇园》正是这种体裁。每一则虽然都较短小,但数目很大,有八卷之巨。其他一些苏非诗人的作品也大都篇幅巨大,如加耶西的《莲花公主传》有1万多行,而尼扎米的《五卷诗》有12万行之多。可谓体大句丽,美轮美奂。

禅诗,一小部分禅理诗有说教之嫌外,从总体上是诗,而不是教义,特别是文人们写的那些禅诗。当然诗僧们当初作法诗、开悟诗,意在传教。但时过境迁,现在人们再读禅诗,即使是说教味十足的禅理诗,也不会将它们作为顶礼膜拜的宗教经典。所以,总体上说禅诗是有宗教味的文学,不是带文学味的说教。

而苏非文学不同,其中一部分是有宗教味的文学,特别是受苏非思想影响的文人,象萨迪、尼扎米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有文学味的说教,特别是那几位正宗苏非派诗人象萨纳伊、阿塔耳和鲁米、贾米等人的作品。萨纳伊的《真理之园》,他本人认为其教化作用可与《古兰经》相比。阿塔耳的《百鸟朝凤》和鲁米的《玛斯纳维》都被视作苏非派的经典。正因为如此,这类作品极受信徒喜爱。《百鸟朝凤》以百鸟喻广大苏非信徒,朝凤旅途艰难喻修行之苦,历经大漠高山,只剩下30只鸟,但终不见凤凰。于是,这30只鸟幡然醒悟,他们自己就是凤凰。以此揭示苏非教义:真主存于每个信徒心中,只要虔诚苦修,便能与真主合一。这样富于文学性的说教,百姓当然乐意接受。

(三)审美需求与宗教使命

中国禅诗的作者,主要是崇佛参禅的文人和一部分爱作诗的僧人。禅诗的欣赏者,比作者队伍大许多。到今天,喜爱禅诗的人更广泛些,但是也仅限制在读书人这个范围内。工人、农民是不大欣赏禅诗的。这是因为创作禅诗比较困难,有人捻断多少胡须也产生不了妙悟。同时,禅诗之妙,不是人人都能体悟到的。这也是禅诗较少具有说教功能的原因。

苏非文学则不然,它具有鲜明的教化目的,既要求寓意深刻,又要求语言准确明快、通俗易懂。这与苏非哲学常用艰深语言不同,因为苏非文学的接受者是全体信徒,其中绝大多数是贫民百姓。所以,苏非文学具有很大普及性。这与苏非派起于民间基层有关。苏非文学一开始就使用当时流行的韵文形式和民间内容。“苏非派人士在宣扬他们的信仰与思想时,利用了新兴的达里波斯语的民间创作。这种利用包括信手拈来的移用,和民歌形式的再创造。”^[10]尽管后来苏非诗人也有非常讲究文采的,但与禅诗作者“得句如得仙”的境地相去甚远。

从上述可知,禅诗和苏非文学的作者群、爱好者(接受者)有很大不同。禅诗的作者和爱好者,基本上是自发的,其动力主要来自审美需求。苏非文学的作者往往为使命所驱,其创作动力来自宗教;信徒接受也都是宗教传播和灌输的结果。

以上简单比较,只是涉及禅诗与苏非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是较宏观和外在的;至于较微观和内在的问题,如两者在审美情趣、典型语言,创作手法等等问题上的异同,尚未涉及。这是一个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新课题。期待学术同好作出进一步研究。

注:[1]元好问《赠嵩山隽待者学诗》。 [2]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3][10]参见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65,366页。

[4]《郁金香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20页。

[5]李振中、王家瑛主编《阿拉伯哲学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06页。

[6]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页。

[7]任继愈、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190年8月版,第245页。

[8]陈中耀《阿拉伯哲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29页。

[9]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575页。

(本文作者 郁龙余 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与传播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兵)